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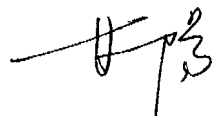
這就表示人必須要去做蘇格拉底提出的「了解自己」的工作。只有做到對自己有相當程度的了解，我們制訂出來的目標才具有意義。這十年來，《二十一世紀》有大量文章是這方面的，我想編者及作者也是基於前瞻必須從現實出發這種了解才討論這些問題吧。

前瞻既有引導性的一面，我想刊物的任務之一也是希望它能夠為塑造未來的歷史盡一份心力。雜誌的性質無論是討論的場所或是提倡及鼓吹一種思潮，它都希望能夠對創造歷史做出一些貢獻。中外歷史上不少刊物都曾經做到這點。例如早年的《新青年》、台灣的《自由中國》及《文星》、西方二次大戰時維也納學派及法蘭克福學派所辦的刊物。《二十一世紀》在這點上也取得了相當的成就。

常聽人說，二十一世紀是甚麼的世紀，我始終認為對歷史作預測是一件危險的事情。我們雖然無法對未來作預測，但卻不可以不對它抱希望及盡自己的力量以創造一個更好的未來。在此《二十一世紀》創刊十周年之際，一方面對它致以祝賀，另一方面也鼓勵它朝這個方向努力。

石元康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

十年來的中國知識場域



在改革已經成為社會主流意識形態以後，中國知識文化場域相對自主性的首要問題就在於，必須避免使知識文化場域完全服從於

改革的需要，防止知識文化場域成為單純為改革服務的工具，尤其必須避免以是否有利於改革作為衡量知識文化場域的根本甚至唯一標準和尺度。



很難相信，《二十一世紀》這份雜誌竟然已經創刊十年，令人想起王安憶不久前的一句話：「似乎是，沒有甚麼過渡的，一下子來到了十年後。」

回想起來，陳方正兄等當時創辦這個雜誌，大概是希望在「六四」後把80年代大陸「文化熱」的香火在香港接下來——現在仍然印在雜誌第一頁上的「為了中國的文

化建設」那幾個字，在當時其實是頗有那麼點悲壯味道的，因為那時無論留在國內還是身在海外的人基本都覺得，在「六四」以後，中國大陸的思想學術文化恐怕將會沉寂相當長的時期。

如果從這種角度來回顧，則我們不能不承認所有人的感覺都錯了。事實是，十年後的今天，中國大陸學術著述和學術出版之興旺，不但大大超過80年代，而且至少從數量的積累上講，恐怕已經超過二十世紀的任何時期。首先是今日國內翻譯著作之盛，實在足以讓任何人目瞪口呆，其總體數量只怕已經難以統計，而且可以說西方的任何思潮、學派、理論、方法幾乎都已經被大量翻譯引入了中國。這種盛況是十年前完全無法想像的。另一突出現象是「中學」方面的出版蔚為大觀，各種基本材料無論經史子集都有大規模的重印或新編；各種專著的部頭越來越厚，各學科的多卷本編著層出不窮。中學研究在質量上是否有重大突破非我敢判斷，但至少就表象上看，90年代似乎「中學」取代「西學」成為中國的「顯學」。

誠然，興旺的背後也不無虛象。例如上述大量翻譯的西學著作，有點像一筆尚未動用的銀行存款，亦即尚未完全融入中國學界的思考和論述。以筆者未必準確的觀察，90年代最有影響的西學著作似乎首推西方的中國研究著作，這大概與上面所說90年代「中學」成為顯學有關。這種狀況有其隱憂，如筆者較早前曾指出：「西方的中國研究乃是西方學術文化大共同體的從屬而非主導，其問題意識、興趣方向、以及理論方法大多都不是自生的而是外來的，亦即是西方學術文化大共同體基本旨趣的派生。如果中國學術文化今後的發展一方面高揚中學和中國研究，但另一方面卻日益缺乏對西方學術文化大共同體基本旨趣的批判檢討能力甚至興趣，而只是以與西方的中國研究『接軌』為滿足，那麼最終很可能恰恰使中國學術文化的整體成了西方學術文化的一個部門性從屬。從根本上講，中國學術文化的自主性有賴於中國學界對於西方學術文化大共同體基本旨趣的批判檢討，亦即有賴於中國學界對於西學和西方的深入研究。」當然，這可能只是我個人的偏見。

與出版業之善於營造學術興旺相比，對今後中國思想學術發展更重要的或許是已經牢固確立的學位制度（特別是碩士和博士兩級學位）。學位制度有利於形成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謂的具有相對自主性的知識文化場域（relatively autonomous fields of knowledge and culture），從而有利於促成中國的知識文化活動具有相對的自律性，而並非完全只受外部政治和商業權力的支配。這一知識文化的相對自主性問題，筆者在80年代末時曾專門作過一些論述，此地想借用布迪厄的「知識場域」（intellectual fields）概念，重新提出這一問題。布迪厄批判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把文化領域完全歸結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以及福柯（Michel Foucault）把所有知識都只看成是社會「規訓」（discipline）的外部決定論，突出地強調知識文化活動有其自身的「場域」即內部過程，從而對其他「場域」特別是政治和經濟場域保持相對的自主性。這些論點對

於我們更深入地認識改革時代中國知識份子的活動方式有一定啟示。我們可以問，中國知識文化場域與改革本身處於一種甚麼關係？或，面對經濟政治場域的大規模改革，知識文化場域是否需要和如何保持自己的相對自主性？

直截了當地說，在改革已經成為社會主流意識形態以後，中國知識文化場域相對自主性的首要問題就在於，必須避免使知識文化場域完全服從於改革的需要，防止知識文化場域成為單純為改革服務的工具，尤其必須避免以是否有利於改革作為衡量知識文化場域的根本甚至唯一標準和尺度。不然的話，知識文化場域就會純粹成為改革意識形態的喉舌和工具，失去其自主性。但問題恰恰在於，知識份子出於支持改革的熱忱，往往會不由自主地從強烈的改革意識形態出發，把是否有利和促進改革作為衡量知識文化場域的先決標準，從而無法堅持知識文化場域的自主性。我以為這實際是改革時代中國知識文化場域的最大困擾所在，也是造成當代中國知識份子諸多尷尬的根本原因，因為改革意識形態的強大正當性壓力往往使許多支持改革的知識份子無法辯護自己的文化主張以及對改革的某種深層困惑，90年代初「人文精神失落」的討論極為疲軟是個明顯的例子。

這種傾向事實上早在80年代文化討論時就已經出現。文化討論的中心問題是所謂中西文化問題，但這一討論往往被解釋成是所謂借鍾馗打鬼，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亦即是知識份子不敢觸及敏感的政治問題而以中西文化問題來借題發揮，許多人更由此強烈指責這正是中國知識份子軟弱性的表現。但這類解釋只能是徒然扭曲這場討論的性質和意義，因為這種解釋和指責完全忽視了，對於許多知識份子來說，所謂中西文化問題本身就是真問題、大問題，套用布迪厄的術語，可以說中西文化問題的思考 and 討論乃是近代中國知識份子的「積習」(habitus)，它由近世西學東漸以來就必然出現，而且在今後仍將長期糾纏中國知識份子。這種思考和討論有其自己內在的邏輯和要求，並不必然要與改革直接相關，並不必然要為改革服務，尤其不能以是否促進改革作為衡量的尺度。

筆者個人因此一向反對用所謂「新啟蒙」來概括從80年代到90年代的中國知識文化狀況。因為這種「新啟蒙」視野實際上是用改革意識形態來全面牢籠知識文化場域，而且往往強烈地用是否有利改革、有利現代化來規範和裁判知識文化場域的問題和討論。所謂「新啟蒙」在80年代時其實主要是指黨內改革派知識份子的論述取向，那時很少有人用「新啟蒙」來概括整個知識文化場域的走向。原因相當明顯，當時的主要民間知識團體如「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以及「中國文化書院」等很難被納入所謂「新啟蒙」的範疇，前者的主要關切在於達成「西學」研究的相對自主性，後者則促成「中學」研究的相對自主性。這兩者與「新啟蒙」派誠然互有呼應，但它們之間事實上存在着一種潛在的張力：西學和中學研究的相對自主性必然要求知識份子深入知識場域自身的語言，即西學和中學的論述語言，從而必須擺脫「改革語言」，但「新啟蒙」派的路向則必然要求不斷強

化「改革語言」。這種張力可以說就是改革意識形態與知識文化場域相對自主性之間的張力。

但在90年代，用「新啟蒙」的角度評論整個知識文化場域卻似乎變得相當普遍。從這種角度，當然不奇怪，許多人振振有辭地批評80年代引進的西學大多是所謂西方反理性主義甚至反現代化的學說，因此不利甚至有害中國的改革和現代化；根據同樣的邏輯，90年代初出現所謂「國學熱」時，海內外都有人強烈懷疑這是否在迎合官方意識形態需要，或至少容易為官方利用；再往後又有所謂「後學」的辯論，很多人強烈認為西方的「後現代主義」等理論不利於中國的改革和現代化，因為中國現在尚未進入現代，等等。

從這種角度來看，90年代在思想意識上的格局似乎反不如80年代來得開闊、舒展和寬容。用改革意識形態來牢籠知識文化場域的要求，自90年代以來似乎變得特別強烈，上面所舉「國學」和「後學」的問題，都是明顯的例子。無論國學還是後學，當然都應該作批判的討論，但這種討論應該以知識場域的語言來進行，以是否有利於對中學西學的深入研究來評判，而不應該用「改革語言」來進行，不能以是否有利改革和現代化來裁判。

這絕不是說知識份子應該躲進象牙塔，不要關心社會政治，恰恰相反，真正的問題在於：知識份子是以知識場域為中介來形塑和開拓政治格局，還是先站定一個「政治正確」的立場並以此狹隘化知識場域的問題。以近年來的所謂「自由派」和「新左派」之爭而言，從知識場域的角度看，首先涉及的是雙方對自由主義的理解差異極大，如果從這種知識場域內的分歧出發進行辯論，本可以使中國知識份子深入理解自由主義問題的複雜性，從而有助於更深入地討論中國的政治問題。但近年的實際情況是，許多人對自由主義理論和歷史的複雜性並無真正興趣，而只是急於給自己戴一頂桂冠，從而炮製種種極端狹隘甚至謬誤百出的所謂自由主義「定義」。例如朱學勤式的定義說「自由主義的哲學觀是經驗主義，與先驗主義相對立」，可是這類定義與當代自由主義理論討論乃風馬牛不相及，更不必說這種定義先把康德 (Immanuel Kant) 排除出了自由主義，純屬外行的自說自話。實際上，這種做法是先從自己的狹隘「經驗主義」出發來狹隘化知識場域的問題範圍，然後再以這種極端狹隘的知識來討論中國政治，導致知識場域和政治場域的雙重狹隘化，結果只能是狹隘加狹隘，越說越狹隘。

由於90年代以來知識份子出現重大分化，各種分歧日益尖銳，更需要知識份子以知識場域為中介來討論政治和公共問題。如果把任何新問題的提出都首先變成政治場域的立場問題，從而只能用政治標籤和政治定性來解決思想爭論，那只能導致中國知識文化場域的日益狹隘化、膚淺化、劣質化。